

## 素什么质

■刘瑜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二字,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陷十足。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他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的专门显示上,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学历,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

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之间水平往来的黏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多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稠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黏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

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四十八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有感,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斥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

## 毁誉

■季羨林

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颓废。

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我记得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人(一只眼者除外)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

还有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孔门贤人子路“闻过则喜”,古今传为美谈。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为我要分析:是谁说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因为什么而说的?分析完了以后,再定“则喜”,或是“则怒”。喜,我不会过头。怒,我也不不会火冒三丈,怒发冲冠。孔子说:“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心里没有像我上面说的那些弯弯绕。

我自己有一个颇为不寻常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学者,过去对于他的存在,我一点都不知道,然而,他却同我结了怨。因为,

我现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认为本来是应该属于他的,是我这个“鸠”把他这个“鹑”的“巢”给占据了。因此,勃然对我心怀不满。我被蒙在鼓里,很久很久,最后才有人透了点风给我。我不知道,天下竟有这种事,只能一笑置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丝毫理由。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不同,遗传基因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恶观等等,都不会一样,都会有些差别。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有人爱黑,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避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可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能长只脚的程度。

(节选自《谈人生》,季羨林著,华艺出版社)

## 城市的底线

■叶延滨

真正的乐观主义者,遇到问题时,最早出现的念头是:“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想吧,把这个想明白了,心里有了底线,阴天变晴,破涕为笑,没有阳光心里也都灿烂如花。

法律就是一个社会的底线,学法懂法,就是知道一天平安的底线在哪里。当然,虽然人人都听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底线是一张网眼很大的网,许多人钻了过去。于是,底线在许多人那里,就不存在了。一个城市与一个人一样,也有它的底线,在底线晃动的现象,与旅游广告和招商广告上的鲜亮画面不一样,与“精神文明城市”之类的称号也不一样,它们更真实地展示了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的“健康状况”,城市的“幸福指数”。

就说这“城市牛皮癣”小广告吧。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大街上,地面上用颜料写满了,收药、卖发票、制各式证件、出租屋、按摩……车站和电线杆上也是,喷涂的,不干胶粘贴的。街道环卫工人也真辛苦,用水洗,用刷子刷,用喷灯烧,用颜料抹,花样翻新,刚干净了,马上又有新的小广告盖了上去。

于是这成就了一个产业:清除小广告产业。最近,街面上出现了专门清洗小广告的“小广告综合处理车”,清洗人员驾驶专业化的三轮车,有一个专业化的车体,各种长短短的工具,清洗液、喷灯,很有技术含量的样子,体现了这个城市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风采!

这也是一条产业链,制作小广告——散发小广告——清除小广告——清洁车及有关工具材料生产,在北京这个在三千万人数千大街的都市里,有多少人由“小广告”找到工作岗位了呢?

一座城市也像一个人,光鲜亮丽地走出家门,臭袜子、脏衣服堆在卫生间里。小广告也是一种“体验指标”和“生存幸福指数”。比方说,北京长安街上的小广告就少,别说小广告了,北京奥运期间,政府一声令,几百万一幅的大广告都从房顶上撤下来。同样的,有保安盯着的大楼,物业管理严格的小区,小广告也少。小广告不仅贴得让人添堵,还招贼,小偷一看满世界的小广告,就知道这地方没物业保安,看到门上贴满小广告,就知道有时间这家没有人住了。

如同小广告是城市底线指标,还有不少类似的东西,比方说公交车站的秩序,有没有排队,排队的人能不能上了车,这些年,经过努力,北京的地铁和公交车排队总算进步了一,是站上自觉



图片来源: <http://www.sjstt.cn>

## 空中花园

■吴念真

几年前听一个朋友说了个故事:有位先生在四十多岁的年纪时放弃了所有东西,跑到山上种花,而那时山上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路。工具,一切的东西都要背上山。他住在山洞中,吃保久乳及饼干,把自己丢在山上,然后在山上种花,至今21年。这其中有16年他都在改良土质及品种,没有半点收入。后来有人上山拍了这位先生,有人问他:“为何有如此的勇气到山上种花?”他简单地讲了一句话:“因为我相信我我可以做成!”“相信”这两个字是如此的有力量。

因为相信了,所以就有力量。

初夏是天山农场忙碌的开始,百子莲、炮圣花、火炬百合、彩色海芋及香水百合都将陆续开放。美丽、丰饶好像是初夏时节天山农场的面貌,但是如果这样的面貌是一个用21年的时间换来的,而这其中有16年的时间都只是在做改良土质、改良品种的工作,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状况下度过,面对这样的人,你能说什么呢?

21年前,四十多岁的钱飞清先生放下他原来的工作,从山下独自步行4个小时到达这片山林时,唯一的企图竟然只是完成自己务农的愿望。步行4小时是因为当时这片山林没有路,没有水和电。开始时,他住在山洞里,靠吃保久乳和饼干过日子,目的只是要种出好东西。以钱先生的说法,所谓的好东西就是别人没有种过的或是种出比别人更好的东西。为了种出好东西,21年来他的确做到了。他改良了原本贫瘠的山地,改良了无数的花种,种出许多台湾没有看过的花,某些花甚至连原产地,如荷兰、南非的农艺专家都自叹弗如,可是唯一没有改变的,却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近乎顽固的工作态度。

常常经过十几年的等待,只为一朵花开。如果等待十年之后失败怎么办?他说:“失败,就从头再来!”这样说着的他好像忘了得失,忘了投

资报酬率,甚至忘了年纪,忘记了一切我们所在意的东西。

7月中旬,即将开始采收的香水百合是天山农场的代表作之一。成株的时候,花茎高达两公尺,花朵直径最大达45公分,每株花最多开花的数量将近30朵。几年前在外籍专家的建议下,曾经申请列入“金氏”世界纪录,然而栽培出这样花种的钱先生,不是博士,没有任何国家补助。得过“优秀农民”奖状的他,证件上甚至连农民都不是,没有资格购买农地,这也是另一种奇迹或是生命力吧!但即使是这样荒谬的事,他好像也不在意,也许就像他那些泰雅族的邻居朋友说的:“为了花,他连吃穿都不在意了,哪有时间在意这些?”

原产在南非的百子莲在早晨炙热的阳光下盛开,经过几年的栽培,今年是第二次收获。钱先生用那近乎膜拜的姿势,一枝一枝采收着花朵时,我们意外地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笑容。他骄傲地告诉我们:“如果在花市或花艺店看到百子莲,最好看的一定是从这里出去的!”说着,我们看到他那自信而又有些腼腆的笑容。

21年前,钱先生因为喜欢农事工作而到山上来,起初是种植苹果、水蜜桃,但之后看到许多进口的东西多又便宜,毅然决定改种花卉。他种过的花卉,差不多有七百多种,失败率是99%。他自嘲地说:“失败没有关系,因为这辈子都在失败中,好像也没成功过。”自认为一生失败,却为1%的成功机会而努力工作着,面对这样的人,除了沉默与敬意之外,自己不知道能说什么。

在台湾已经很少有人把一个愿望摆在10年或15年之后了,那样的成就与利益都是眼前看不见的,唯有用时间去拼斗,成功最好,即使失败也认了。台湾的可爱就是还有这些傻子,有人把青春放在山上做赌注,所以在台湾海拔1800公尺的山上,可以看到那样令人欣喜的美丽。

(节选自《台湾念真情》,吴念真著,译林出版社)

## 郑和的大航海为什么失败

■赵楚

近年来,有人不断回顾郑和下西洋的伟大经历,感慨道:要是明初继续支持郑和的大航海活动,则后来泰西列强对东南亚的殖民历史必将改写,从而今日也不会有主权争议的麻烦云云。

然而,历史学面对的并非实际未发生的可能之事。郑和的航海活动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中国文明的力量也并未因为这些活动而完成从陆权向海权的转变。此中自有至今仍值得汲取的教训。

史载郑和的首次远航发生于1405年,相距后来的“地理大发现”要早差不多100年。尽管后世历史学家对郑和航海的贸易意义有特别的强调和罗列,但历史学家推测,郑和航海还是为了宣达国威,巩固朝贡体系,其次则是寻找建文帝下落,再次才是所谓“互市”的经济利益。

巨量资源支持这样的战略间接路线。

而且,在航海技术方面,史载和传说中的巨大宝船建造科技是否真实呢?从欧洲帆船战船时代的实际情形看,中国在此时期建造出适合远洋航行的巨大木质帆船,是可能的,但即令承认造船技术上的可行性,郑和的大航海活动的结果,依然是难以按照我们期望的脚本发展。通过对欧洲海权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海权与技术并非直接关联,而是受社会形态的直接决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先的年代,他们并未建成堪与后世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比拟的殖民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体系,而且是基于现代工业和社会价值的全球体系。

新兴的英式殖民体系与近代化工业、市场活动相表里,蒸汽机动力的钢铁巨舰有机地吧全球基地体系和市场体系连为一体,成了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位一体的全球化怪兽。这在郑和时代都是

## 微时代的身心问题

■邵元元

现在的公交、地铁、商场、图书馆、电影院、课堂、各类会场和聚会上,“人手机”非常普遍。好像有谁一声令下,大家都不约而同把目光聚集在掌上小小屏幕,拼命搜索、观看、制造、发送某个最新消息、最高指示或终极画面。不久前还在讨论“读图时代”是否来临,古典(经典)阅读是否消失,新媒体是增进还是阻碍人类交流,是有利民主增长还是有利全媒体控制,转瞬之间又发现已经到了由“微博”主导的“微时代”。

讨论与新媒体有关的问题,起码条件是身体要好。身体不好,侍候不了机器,一切免谈。有人坚持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佩服这毅力和气魄,可惜做不到,猜想他们的坚持也很勉强吧?但新媒体或微媒体时代是否允许这群人存在?从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来看,应该也有他们生存的权利;我就希望逐渐向他们靠拢,并相信热衷新媒体的人等到身体逐渐被机器整垮,也会向他们靠拢。

“新媒体”、“微媒体”之类的话题就交给身体强壮、经得起折腾、喜欢折腾的人们去议论吧,我辈不妨听听,看看,没有发言权,也不想借助新媒体获得哪怕一粉丝。没有粉丝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要说粉丝越多越好,倒也未必。鲁迅说过,发明牛痘的隋那没有动辄杀人的拿破仑有名,但隋那的贡献仍旧不容抹煞。

“澳门豆捞”调料众多,任君挑选,颇受大众欢迎,但吃多了口感也会坏起来。调料本身应该没问题,是贪婪得到了报应。一个人的舌头不能在同一时间尝太多味道,“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新媒体、微媒体让我们太容易获取太多信息,是否也会带来类似后果?

这还是形式和工具问题。偶尔通过周围人的转述,间接关注一下新媒体和微媒体的信息内容,觉得还是“怪力乱神”居多。许多所谓新东西被新媒体一包装,确实光鲜,但很可能是陈年旧货改头换面,重新出炉。当年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建成,梭罗曾打趣说,美国人靠这种高科技从大洋彼岸获取的概况也就是“女皇今天没有感冒”之类的信息。梭罗还太善良,至少他没有想到今天新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八卦何止无聊(比如告诉全世界跟谁一起吃饭),已经严重污染了精神生活,而人也并不具备对付这种自我污染的能力。

晚清“洋务运动”激起不少守旧分子的抵抗,他们污蔑西方科技是不值一晒的“奇技淫巧”。另一方面,国人又恰恰比较喜欢躺在家里享受“奇技淫巧”。新媒体比过去的“奇技淫巧”厉害多了,一机在手,可以遨游、掌握、统治全世界,好比魔鬼对耶稣的诱惑,让他瞬间看遍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过去常常纳闷魔鬼怎么这么大本事,竟能同时呈现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现在看来也并不稀奇,人类不是几百年已经拥有这本领了吗?问题是怎么去面对拥有这个本领之后所看到的一切。表面上人在“微时代”赢得了许多便利和权力,但那无数看不见的电波的真正主宰如果并非人,而是保罗所谓“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又会怎样?

现代媒体勃兴以来,国人“攘袖而论国事”的兴趣不比任何一个民族差,追逐新媒体带来的新感受与新可能性也绝不来自今日始,但为何如此热心的追求媒体创新,但很少得到媒体祝福,反而经常因为媒体而惹祸?不是有报道说许多人(包括中小学生)因为沉溺于新媒体技术所提供的垃圾信息而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吗?“举国孱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青年鲁迅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也还不算偏激。

应该怎样更多在还不只在工具形式上做文章,应该如何向新媒体输入健康美好的信息,使大家在新媒体上同样能够获得有益的交流,使之为人所用,而非“人为物役”,沦为新媒体的牺牲品?夸大一点讲,今日中国文化建设应以提高人的素质、在自由宽松的政治空间和理性健康的教育体制内争取个人全面发展为优先,还是以片面发展机器技术和赢取与之匹配的商业利润为优先?

(节选自《文汇报》,2012年8月9日)